

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

——中亚东干文学之定位及研究趋势

常文昌¹ 常立霓²

(1.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2. 上海政法学院中文系, 上海 201101)

内容摘要: 提出世界华语文学的概念, 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 勾画了东干文学的演变历程, 把民间文学与俄罗斯文学视为东干书面文学发展的两大动因, 并从拼音文字、语言、文化等不同层面揭示了东干文学独特的研究价值。由于中国文化是东干文化的母体, 因此中国学者具有别国学者无法取代的研究优势, 中国研究者能破译东干语中的某些文化密码, 在对东干语言、文化、文学的看法上, 中国学者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学者不同的观点, 预见世界东干学研究中中国学派形成的可能性。

关键词: 东干文学; 东干学; 华语文学; 中国学派; 中亚; 回族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9)03-0052-07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东干族, 是130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于1877年开始)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 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 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族。据胡振华考证, 苏联1924年民族划界、民族识别时, 把中亚回族的民族名称定为“东干”^[1]。

1900年, 关于东干民族志的第一批资料, 东干民间口头创作的第一批作品发表^①。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生B. 齐布兹金作为教师工作在马三成(原东干名营盘)学校, 他和A. 什马科夫共同发表了《关于七河州比什凯克县卡拉库努孜村东干生活札记》, 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东干学的研究。

一、东干文学定位

东干文学是东干学的组成部分, 关于东干学的归属问题, 苏联时期, 东干学为汉学的一个分支。东干学研究者B. M. 阿列克谢耶夫、李福清、Л. H. 费谢科、Л. H. 杜曼、Г. Г. 斯特拉塔维奇、H. H. 切包克沙洛夫、A. A. 德拉古诺夫、E. Д. 波里瓦诺夫等, 都是汉学家。从研究机构来看, 与东干学相关的多为远东民族学和东方研究所, 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民族研究和东方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20世

纪50年代,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了东干学部, 这是苏联惟一的东干研究的专门机构。而在中国, 东干学在整体上, 又划归回族学。有关东干民族与文化的资料和论文, 一开始在《回族研究》和民族研究的相关刊物上发表。而东干学的分支又分别划归别的学科, 如东干语隶属于西北方言。“东干”与“回族”这两个概念的用法, 也不尽相同。中国学者把“东干”作为中亚回族的专门称呼, 而中国的回族与世界各地的回族, 都不叫“东干”。而东干人在两种语言(东干语和俄语)里, 使用不同的概念。在东干语里, 东干人自称回回、老回。而东干人用俄文说话或写作, 则称本民族为“东干”。P. 尤苏波夫主编的《东干》杂志封面, 同时用几种文字书写: 汉字标出“回族”二字, 东干拼音文字叫回族杂志, 俄文则写成东干。而东干人的俄文著作或论文, 不仅把中国的回族称东干, 同时把世界各地的回族通通称为“东干”。这是沿用苏联学者的术语。

同上述概念相联系, 东干人在东干语中称自己的文学为回族文学, 在俄语中则称东干文学。而中国则称之为“苏联东干文学”或“苏联回族文学”。苏联解体后, 则称为“中亚东干文学”或“中亚回族文学”。一方面为了区分中国回族与中亚回族, 另一方面考虑到俄语中的通用东干概念, 我们将名称定为“中亚

收稿日期: 2008-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W057)

作者简介: 常文昌(1947—), 男, 甘肃镇原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东干文学研究。

①关于东干研究第一批资料公开发表时间的说法不一, 此处依《吉尔吉斯斯坦百科全书》的说法。

东干文学”。

一方面, 中亚东干文学曾属于苏联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 也属于中亚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中亚东干文学的源头, 尤其是口传文学最初是从中国带来的。东干文学以西北方言为主体, 又借用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周围民族的某些语汇, 同时还体现了回族的文化心理与风俗习惯。也就是说, 东干文学是在中亚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及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它有中国的种子, 却是在中亚东干民族的土壤中生长的。一方面, 它受俄苏文学、吉尔吉斯及哈萨克文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与中国西北民间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它不是中国回族文学的一部分, 只是中国回族文化在中亚大地上的传承和变异。

由于中亚东干文学是用中国西北方言创作的, 它的族群又是中国回族后裔, 因此, 我们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

笔者认为, 华语文学比华文文学的概念更好。语种是文学种类的最主要的标志, 在世界较大的语种文学中, 按惯例通常划分为: 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讲, 德语文学包括德国作家、奥地利作家等。因此, 华语文学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等正好在概念上是对应的, 这是其一。其二, 东干文学不是用汉字书写, 而是用33个俄文字母外加5个字母拼写而成。它的文字是东干文, 因此华语文学包容东干文学更为贴切。

我们所说的华语文学的内涵, 一方面照顾到语种, 包括世界上所有用华语创作的文学, 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 也不管民族属性, 像日本汉诗也可以归入华语文学。另一方面, 华人华侨的双语或多语创作, 也属于华语文学。东干文学中, 如亚瑟儿·十娃子同时用东干文、俄文、吉尔吉斯文创作, 都属于华语文学的研究范围。语种与民族属性这两个主要元素中, 也有交叉甚或矛盾之处。如日本汉诗的作家不是华人, 华人作家的英语或俄语书写又算在华语文学中。但将概念这样界定后, 华语文学就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内涵, 也更为合理。

二、东干文学的发展历程

不同于别的国度和地区的华语文学, 东干文学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 从没有文字到有了文字, 并创作了多种形式和体裁作品的发展过程。在较短的时期, 完成了“宏伟的历史转变”(法蒂玛·玛凯耶娃语)。十月革命前, 东干人只有口头文学, 包

括民歌、传说、故事、谚语、谜语等。这些口头文学许多都是从中国带来的, 如有的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 有的源自民间故事, 如孟姜女等。也有新创作的, 如反映东干人西迁历史的。1900年, 俄罗斯学者收集并发表了第一批有关东干民族生活风俗的资料, 也包括口头创作的文学。一般认为, 东干书面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和东干报刊的发行, 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

如果从1931年东干诗人亚瑟儿·十娃子的第一部诗集——《亮明星》的出版算起, 东干书面文学已有70余年的历史。东干书面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有两大动因不可忽视: 一是将俄罗斯文学翻译成东干文, 一是东干民间文学的作用。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为了探求本民族文学的创作风格和发展方向, 首先借助艺术水准很高的俄罗斯文学, 将它们译成东干文。他们翻译了普希金诗集、克雷洛夫寓言、涅克拉索夫长诗及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的小说。如果将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草婴译文和东干作家Я. 哈娃佐夫译文加以对照, 会发现两种文本各有胜境。而西北人读东干作家的译文, 备感亲切。通过翻译, 不仅大大提高了东干作家的艺术修养, 同时也为东干书面文学提供了参照。而东干民间文学则是东干书面文学产生的直接基础,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东干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语言形式等对东干书面文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与驱动作用。1932年创办的《东火星》报为东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阵地。其中的“文学创作”栏目, 发表了一系列随笔、诗歌、小说, 成为培养东干青年作家的摇篮。后来创办的《十月的旗》《东干报》《青苗》《东干》等报刊为东干文化和文学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过几代东干作家的努力, 东干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亚瑟儿·十娃子、阿尔利·阿尔布都、Ю. 杨善新、K. 马耶夫、Д. 阿布杜林、X. 马克、Ю. 从娃子、M. 哈桑诺夫等作家为东干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稍后活跃在文坛上的Э. 白掌柜的、X. 拉阿洪诺夫、M. 伊玛佐夫、И. 十四儿等都奉献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在东干文学创作中, 女诗人、女作家也不可忽视, 她们是A. 曼苏洛娃、A. 索娃扎、X. 丽娃子哈德瑞耶娃、Я. 哈娃扎等。

在东干作家群中, 十娃子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 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 吉尔吉斯斯坦授予他“人民诗人”的光荣称号。十娃子是东干文学的经典作家,

其作品可以称为东干民族的史诗或心灵史,他影响了几代东干诗人。另一位重要作家是阿尔布都,他的创作代表了东干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东干族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差不多全方位地反映了东干民族的文化心理。十娃子和阿尔布都可以并称为东干文学的双子星座。

三、东干文学的研究价值

文学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民族心理的折射。恩格斯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要全方位地了解东干族的心理和生活,最好的途径是去阅读他们的文学。

从世界华语文学的视野来揭示东干文学的独特特点,可以对汉语语言文字、文学乃至文化、民俗等引出许多新的思考。东干文学的独特景观可以从以下不同层次来加以认识。

从文字层面看,中国汉语书面文学及世界各地的华语书面文学,都以汉字为载体。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中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东干人迁居中亚后,汉字失传了,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东干人采用俄文字母另加5个新字母拼写汉语。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中国,瞿秋白、萧三、鲁迅、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胡乔木、欧阳山、柯仲平等都提倡汉字拉丁化。在苏联,在海参崴和伯力的中国工人中,也推行过拉丁拼音文字。而中亚东干人几十年来,熟练地运用拼音文字,对推动东干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并列,并进入网络系统,以避免汉字检索中的许多困难,可供思考。在世界华语文学中,像东干文这样独特的文字,是绝无仅有的。

从语言层面看,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各不相同。普遍采用通用的现代汉语,为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又剔除了方言中的许多词汇,方言中许多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也随之丢失。东干语以西北方言为主。东干报的一篇文章题为《心劲大的科学人》,如果我们用现代汉语变成“顽强拼搏的科学家”,就失去了新鲜感。难怪一位中学教师读拙文《吉尔吉斯斯坦的“甘肃村”》^[3]后感叹道:“我们自己丢失了西北方言中的许多好东西,这些东西在东干人那里却保存着。”东干语言是以西北方言为主体的,同时又融入了俄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词汇。在东干口传的民间故事、口歌口溜中,差不多是最纯粹的西北方言。而在描写新人新事新生活的作

品中,借词或东干人自创的新词相对比较多。认为东干语是中国晚清时期的西北方言,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东干语中,确实存在着晚清语言的活化石,如把钱叫帖子,当时洋务派发行的纸币,就叫帖子,而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帖子为何物。在比什凯克市场上,常听到东干人把10个索姆,叫10个帖子。而俄罗斯老人则沿用旧制,叫10个卢布。但是东干语中也有许多现代汉语新名词,如共和国广播电台中的节目,“新闻”就是汉语新词。十娃子诗中的电灯、电话、俱乐部等都是来自中国的新词。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东干语就是晚清时代的西北方言。东干语中常有颠倒的词,如现代汉语“学习”,东干人叫“习学”,“土地”叫“地土”,“冤屈”叫“屈冤”,“迎接”叫“接迎”、“蔬菜”叫“菜蔬”,“蹊跷”叫“跷蹊”等。中国研究者还考证,东干语中有些词汇来自《老乞大》,如“菜蔬”。其实《水浒传》中就叫“菜蔬”。而东干语中保存了不少明清时代的口语。中国西北农民至今也仍叫“菜蔬”,而不叫“蔬菜”。有的词汇又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化,与今天的西北方言产生了某些错位。东干语中的许多复杂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从文化层面看,东干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文化这个概念的包容量极大,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列举几条线索。首先,东干文学展示了新文明与旧传统的冲突。如东干小说与诗歌中都表现了女性婚姻发展的几个阶段,最后新文明战胜了旧传统中的落后东西,妇女得到了解放。其次,在东干文学中,还可以发现活的文化化石与新文化并存的景观。阿尔布都的短篇小说《补丁老婆》中的老寿星补丁老婆就是东干旧时代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活见证。小说中所描写的习俗,同中国旧时代完全一样,一件东西要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玉器,打破了要钉个补疤。瓷器,尤其是细瓷器,如茶壶、细瓷碗破了,也要请匠人钉。笔者就亲眼见过祖传几代的钉补疤的瓷茶壶、玉烟嘴、石头眼镜等。阿尔布都的《瓶》,描写从中国带来的一对瓷瓶中的一个打了,也想叫匠人钉一下,但钉上的就不值钱了。《补丁老婆》中讲述东干人过去穿衣服,先正穿,然后翻过来穿。破了,先自己补,补得不能穿了,再送给补丁老婆去补。补丁老婆是专门给人补补丁的匠人。她人格高尚,把别人衣服口袋里的金丕儿也送还给人家。金丕儿是旧时代的货币。短短的一篇小说中,传达了不少旧时代的文化信息。

在东干文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特点。东干族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东干文化具有伊斯

兰文化的特点。从阿尔布都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东干族的经堂教育。早先,让孩子读经,是东干人的传统观念。孩子背上写有经文的牛胛骨,去清真寺里读经。后来,学校教育才为许多东干人所接受。阿尔布都小说中,写到古尔邦节,即宰牲节,根据伊斯兰传说,认为人死后要通过绥拉特桥,这桥像头发丝一样细,一边是狼虫蛇蝎,一边是火海。宰牲节,杀牛宰羊,死后牛羊可以驮着顺利通过绥拉特桥,进入天堂。由此可以看出东干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色彩。

中国文化是东干文学的主要资源之一,十娃子有几十首诗取材于中国,如《给诗人屈原》《宁夏姑娘》《在伊犁》《我爷的城》《上海的买卖》等。阿尔布都、伊玛佐夫、曼苏洛娃等作家也有这方面的作品,而中国意象在东干文学中也不少见。我们可以举出十娃子的《柳树枝》,生活在中亚的东干姑娘,不是以玫瑰花、石榴花表达爱情,却给她所爱的小伙子送了一枝毛柳枝,小伙子很懊丧,以为姑娘不爱他。后经长者点破,他才后悔莫及。“柳”与“留”谐音,中国古代就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表示依依惜别。许多东干青年人尚不理解这首诗的折柳含义,不理解中国文化符码的意义。此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感情,如怀乡、恋乡等在东干文学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在前苏联多民族文化中,俄罗斯文化是强势文化,它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正如 Ч.艾特玛托夫所说:“每一种当代的苏联文学,都有两个起源:一个是本民族的传统,一个是俄罗斯文化的传统。”^[4]俄罗斯文学对东干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干文学是在俄苏文化的大语境中发展的,无论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在美学追求上,东干文学受高尔基等作家影响,塑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东干乡庄的新面貌。在题材与主题上,也与俄罗斯文学相接近,如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以具体作家而言,十娃子受俄苏诗歌影响颇为明显,如他的公民诗,不仅受查尔查文、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公民诗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受马雅可夫斯基等新公民诗的影响。东干诗歌形式,也试验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形。哈桑诺夫的讽刺小说受契诃夫的影响也有迹可寻。阿尔布都小说中运用克雷洛夫寓言,十娃子诗歌中运用俄罗斯民间说法幸运汗衫等,都为作品增添了动人的色彩。而东干文学与吉尔吉斯等周围其他民族作家作品的交流与对话,吸收与共融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以上已经涉及到文学的影响问题。从文学层面

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一是东干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俄罗斯文学与民间文学是东干书面文学的两大动因,中国西北民间文学则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发酵剂。东干小说中运用了许多中国西北流行的谚语,东干人称之为口歌口溜。民间故事的题材与情节在书面文学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梦先生、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都直接进入了他们的作品。东干文学是在与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学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的,从文学风格上看,更具有民间性,即更朴素,更通俗。其书面文学语言与民间口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是真正的“言”与“文”的合一。东干文学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四、东干文学的研究状况与趋势

东干学及东干文学的研究,如果依《吉尔吉斯斯坦百科全书》的说法,从1900年算起,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5]。比东干书面文学还早30余年。

东干学的研究格局可以分为语言、历史、文化、文学、民俗、民族等几大板块。

国外的东干学研究,成果最可观的是语言。从1928年到1954年,东干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创制东干文字,由阿拉伯字母到拉丁字母,最后定型于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1968年,东干学者 Ю.杨善新编订出版了《简明东干语—俄语词典》(东干文为《简明的回族—俄罗斯语词典》)收入近六千个词条。1981年由 M.伊玛佐夫、A.卡里莫夫、M.苏三洛、Я.哈娃佐夫、Ю.从娃子、亚瑟儿·十娃子、Ю.杨善新共同编写出版了颇具规模的三卷本《俄语—东干语词典》。俄罗斯学者 E. Д.波里瓦诺夫出版了《东干语言的主要特点》,A. A.德拉古诺夫出版了《东干语法研究》。此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 M.伊玛佐夫博士撰写出版了一系列东干语研究著作,计有《东干语音学基础》《东干正字法》《东干句法纲要》《东干词法纲要》《东干语法》。可以看出,国外关于东干语的研究全面而深入,已经颇具规模。

在东干历史研究方面,著名东干历史学家、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 M.苏三洛博士出版了他的历史研究(包括东干民族、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内容的)著作。

在东干文学研究方面,成果也较为显著。著名俄罗斯汉学家、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李福清教授和东干学者 M.哈桑诺夫、H.尤苏波夫共同编著的《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不仅收集了72篇东干民间故

事(其中5篇译自中国回族民间故事),有的一篇包括几则故事或笑话。同时还有总论《东干故事的艺术世界》及研究者撰写的《东干故事的情节来源与分析》。这是一本严谨的质量较高的研究著作。李福清不仅研究中国文学,同时又研究远东乃至世界民间故事,资料翔实,学术眼界开阔。继李福清之后,2004年,东干学者И.十四儿出版了他的《中亚回族口头散文创作》,即《中亚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东干民间故事,也有比较新颖的观点。在东干书面文学研究方面,法蒂玛·玛凯耶娃于1984年出版了她的《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是迄今惟一的一部东干文学简史。作者熟悉俄罗斯文学,能把东干文学放在苏联文学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书中除了总论外,重点评述了亚瑟儿·十娃子、X.马凯、阿尔利·阿尔布都、M.哈桑诺夫及年青作家M.伊玛佐夫、И.十四儿、女诗人X.拉娃兹哈特热耶娃等作家,同时还论及K.马耶夫、Ю.杨善新、Ю.从娃子、A.马存诺夫等人的创作。稍后,还出版过伊玛佐夫的《亚瑟儿·十娃子》《阿尔布都》等小册子,对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做了细致的研究。21世纪初,吉尔吉斯斯坦还出版了中国研究者常文昌的俄文版《亚瑟儿·十娃子与汉诗》,对诗人与中国诗歌创作及中国文化资源作了比较与开掘。此外,日本、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等学者也参与了东干学的研究。

中国的东干学与东干文学研究起步较晚,1996年郝苏民、高永久翻译出版了M.苏三洛的学术著作《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俄文书名为《东干人的历史与民族学概述》)^[6]。差不多同时出版了杨峰翻译的东干小说散文选《盼望》^[7],为中国读者了解东干学与东干文学提供了方便。稍后,王国杰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和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相继出版^[8-9],作者不仅实地考察了东干族的生活习俗,同时还查阅了有关图书资料及国家档案,标志着中国的东干学研究正式起步。2003年国内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本东干语言研究著作,一本是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10],一本是林涛的《中亚东干语研究》^[11]。两书的体例与思路大体相仿,既有对东干语语音、语法、词汇等的总论,同时又附有词汇表。王小盾从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2]。丁宏翻译出版了伊玛佐夫编著的《亚瑟儿·十娃子的生活与创作》^[13]。

虽然近十多年来,似乎出现了小小的“东干热”,乌鲁木齐、北京、兰州、银川、西安、南京等地形成了东干研究的几个点。但总的来看,国内的东干文

学研究仍是一鳞半爪,不成气候。

由于有的研究者不熟悉西北方言,或不精通东干文,翻译的诗文错误百出,论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商讨。华语文学研究者多为东南沿海及内地人,主要关注台港、东南亚及欧美华语文学。由于语种、地域上的隔绝等多种原因,东干文学至今差不多还是世界华语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

从世界东干学的研究看,中亚东干学者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苏联时期,俄罗斯学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他国家的研究,只是星星点点。自苏联解体、中国逐渐崛起后,东干学研究的格局与趋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俄罗斯的东干研究趋于沉寂,用李福清的话说,过去是一个国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所以不像从前那样关注了。而中国学者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国家民委社科基金也予以立项。甚至企业家出钱资助东干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随着俄罗斯东干研究的沉寂,中国的东干研究正在兴起。

五、中国东干学派形成之可能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有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区别。法国学派重影响研究,而美国学派则重平行研究。东干文学研究,有没有可能形成中国东干学派?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

在东干文化融合的成分中,俄罗斯学者对东干文化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比中国人看得更清;由于东干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人对东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则更有发言权。东干学者对自己文化资料的掌握,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了解,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汉字的失传,由于东干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与中国文化处于隔绝状态,有时也势必造成“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现象。读东干学者Ю.从娃子撰写的《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即《东干语源词典》)一书,一方面,对其想象与判断能力,感到佩服。如何谓五谷,东干学者不可能翻阅典籍,查找源头。作者这样写道,五谷中“五”表示的是数儿,“谷”解释为五种粮食颗粒:麦子、米、黄米、大麦、黄豆。而《现代汉语词典》说,古书中对五谷有不同的说法,通常指稻、黍(去皮叫黄米)、稷(有说是谷子)、麦、豆。可见,东干学者对五谷的解释与中国学者的解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失传,单从拼音文字上看不出某些词的原本意义。从娃子对“八字胡”的解释是“八字”为“一把子”,八字胡就是一把子胡子。这同汉语的两撇胡子,大相径庭。对“八哥”(鸟儿)的解

释说,“八”字怎么来的,不知道。“哥”应为“鸽子”这类鸟的总称。而中国《辞海》的解释是:“八哥”,亦称鸚鵡、鸚鵡,羽翼有白斑,飞时呈露“八”字形,故称“八哥”。《辞源》解释引《负暄杂录》南唐李后主讳煜,改鸚鵡为八哥。按广韵谓鸚鵡为咧咧鸟,八哥之八即咧之误。为什么称“哥”?笔者猜测,八哥能模仿人说话,所以不叫“鸽”而叫“哥”。可见,由于汉字失传,中国学者在东干语源的研究上,能弥补东干学者之不足。其次,在文化符码上,如亚瑟儿·十娃子的诗《柳树枝》写东干姑娘以柳枝表达爱情,这种文化符码的含义,许多东干人已不理解。而熟悉中国古代折柳送别习俗的中国学者则可以弥补东干人这方面的不足。

在东干学研究上,中国学者虽起步晚,但目前已经显露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如对东干语的看法,东干语是不是独立的语言?国外有学者认为是独立的语言,与汉语不同。而中国学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东干语是汉语陕甘方言在境外的一个变体,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回族的一种跨境方言,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在东干文学研究上,中国学者将东干文学纳入世界华语文学的范围,比较中亚东干文学与东南亚及欧美华语文学之联系与区别,更容易认识东干文学的独特性及共性。对东干文字的看法,有中国学者认为,由于东干成为汉语的一块“飞地”,其口语文学基本停滞下来了。东干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汉字的支撑,有的词语变成了死词(如“茉莉花”唱成了“毛栗子花”)[12]。这些观点虽是一家之言,却也显露出中国研究者的不同视角。

东干学研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避免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接触东干语言文学的人,往往觉得东干语太土气,东干文学难登大雅之堂,这种立场无疑是狭隘的。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即以“板凳”的称谓讽刺了阿Q的狭隘。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错对之分。张隆溪曾援引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例子,汉语叫水,俄语叫瓦达,英语叫窝头,法语叫滴露,没有土气与洋气之分。又如,现代汉语叫“幼儿园”,东干人叫“娃娃园”,不能认

为后者很可笑。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叫“幼稚园”,是否也很可笑?东干语中有些是中国古代及民间运用很久的语汇,现代汉语中变了,东干语中却没有变。举一个例子,东干语“民人”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人民”。这种倒置的例证很多,中国人往往觉得别扭。中国的先圣孔子的《论语·先进》中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里“民人”是老百姓,比现在所说的“人民”要早得多。

东干人创造新语汇,有自己的法则。东干人把男老师称“师父”,这是中国旧时通用的叫法。旧时学艺,要先拜师父。《西游记》中三徒弟称唐僧为师父。因此师父与老师为同义语。中国学生把老师的夫人叫“师娘”,东干人却把女老师叫“师娘”。师娘与师父并称,不也有其道理吗?“学校”是现代汉语的新名词,东干人仍沿用旧称“学堂”。中国有一首歌唱道:“小嘛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教室”这个词,东干人不愿借用俄语,而管它叫“讲堂”,讲堂与学堂也是相互联系的一组词。读哈桑诺夫和白掌柜的他们的小说发现,“农业大学”东干人都叫“乡家户大学”。白掌柜的是东干乡庄中小学教师(中亚学校从1年级到11年级没有小学、中学之分),他的中小学生学习题材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课程名称上,东干人把算术叫账算学,把劳动课叫功苦教课。东干口溜“人靠功苦值钱,树靠花果围园”。“功苦”即劳动,东干人把教育叫调养,小说中就有师娘调养家的角色。把数目叫码子,没有加减乘除这样的术语,分别叫添的(加),取的(减),总的(乘),分的(除)。

至于东干语中的俄语借词,这不是东干语中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华语,尤其是居住在不同国度华人华侨语言的共有现象。汉语具有很强的同化力,但也不妨借用外语。石榴、葡萄是中国古代从中亚传来的,也是外来词。现代人语言交流中的麦克风、麦当劳也是借词。

因此,对东干文学的研究,要破除偏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要脱离东干人生存的文化语境,用我们的语言文学惯例去苛求他们。在这个立场上,建立起东干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才是有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 [1] 丁宏. 东干文化研究: 序[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1.
- [2]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63.
- [3] 常文昌. 吉尔吉斯斯坦的“甘肃村”[N]. 甘肃日报, 2003-08-20(5).
- [4] 陈学讯, 编. 艾特玛托夫论少数民族文化[J]. 民族文学研究, 1986(3): 84-88.

- [5] Кыргызста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M]. Бишкек: Цент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2001: 446. (《吉尔吉斯斯坦: 百科全书》, 比什凯克: 国家语言与百科中心, 2001: 446)
- [6] 苏三洛. 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M]. 郝苏民, 高永久, 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 [7] 杨峰, 编译. 盼望[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 [8] 王国杰.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9] 丁宏. 东干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海峰. 中亚东干语言研究[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林涛. 中亚东干语研究[M]. 香港: 香港教育出版社, 2003.
- [12] 王小盾. 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J]. 文学遗产, 2001(6): 117-125.
- [13] 伊玛佐夫. 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 丁宏, 编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A New Continent of Worldwide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the Position and Research Tendency of Central-Asia Donggan Literature

CHANG Wen-chang¹ CHANG Li-ni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2. Chinese Department, Shanghai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llege, Shanghai, 20110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worldwid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sitioned Donggan Literature as a branch of worldwid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n described the evolution of Donggan Literature. The paper attributed the causes for Donggan textual literature development to folk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evealed the unique research value of Donggan literature from levels of alphabetic writing,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By reason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the matrix of Donggan culture, Chinese scholars enjoyed research superiority which other country scholars shall not substitute. Chinese researchers can decipher some of the codes in Donggan language. In the concept of Donggan languag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t forth the idea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country scholars, and foresee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Chinese school in the worldwide Donggan study.

Keywords: Donggan literature; Donggan study;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school; central Asia; Hui nationality

(责任编辑: 李向辉)